

福特訪北平與「新太平洋主義」之宣告

陳紹賢

北平之行主要目的何在？

福特總統於十一月十三日正式宣佈他將訪問北平。在他作此決定之前後，美國人士曾紛紛以各種理由，懇勸他宜致力於當前國內各項迫切問題之解決，無須往訪那內部動盪危機四伏的北平政權，而徒勞長途往返。

在這種勸阻甚至反對的呼聲中，福特無所感動，而繼續作往訪的準備。終於十二月一日飛抵北平，進行五天的訪問活動。在此期間，美國內外的輿論諸多推斷其此行之主要目的，在於施展其外交才能，由隔洋的電視傳播，以引起美國選民的注意，為明年競選總統奠下良好的基礎。

當時隨福特東行的美國記者有報導在北平的雙方會談，福特親自主持的佔十分之八、九，少數次要的由季辛吉去主持。這種報導能否改變美國選民的一般印象——季辛吉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實際主宰者，還有待於事實的證明。

可是，當時針對福特的競選目的，指出其將感失望的言論頗多。只舉十二月一日——福特飛抵北平那天的這種言論，如哥倫比亞廣播系統（CBS）的評論，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社論，國際前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社論，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專論，甚至素著保守持重的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也於是日的社論指出：「福特希望北平之行獲得的選舉收穫，將極有限，也許會喪失一些原有的支持者。」十二月八日的美國「新聞周刊」有篇專論其中提到福特訪北平時的美國電視傳真，而表示懷疑那種情景會給他在皮奧利亞（Peoria）贏得許多選票。

美、毛會談有何結果？

福特訪北平與「新太平洋主義」之宣告

福特與毛、鄧、會談有了什麼結果？對此問題，目前只能就已發表的雙方致詞，以及隨行記者發出的報導，或間接透露的消息，加以研索。

福特與毛澤東會談一次，與鄧小平會談三次。外電對福、毛會談與福、鄧第一、二次會談的報導，只說是：「雙方對廣泛的國際問題交換意見。」對福、鄧第三次會談，說是：福特表示雙方關係已見加強；會談的結果，在未來若干月將具有意義。凡此都是諱莫如深的话。

十二月一日晚鄧小平在歡迎宴會致詞中說：目前的國際情勢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緩和』的辭藻掩蓋不住戰爭日益增長的嚴酷現實。」

福特的答詞中說：「我們繼續決心反抗威脅別人獨立和幸福的任何行動」，「我們也將繼續努力爭取實現一個更為和平的世界。」由此，可見雙方在各說各的之外，對美俄「和解」問題的立場分歧。毛共反對美國與蘇俄「和解」，在季辛吉前月訪北平時，鄧小平已更露骨地表明了。

四日晚，福特在告別宴致詞時說，他與毛、鄧的會談「是友好、坦率、有實質內容和建設性的」討論了雙方的分歧，也肯定了雙方的重要共同點。「其中一點是雙方同意不對別人稱霸，並且反對別人把霸權強加在世界任何地方。」又說：「美國堅定地致力於一個大家都享有和平、正義和繁榮的國際秩序。這個任務要求有堅定的原則和適應具體情況的策略。它要求有國力和運用國力的意志，也要求有避免不必要的衝突之審慎態度。它還要求能接受和平的變革，以適應人類要求進步的願望。大家必須都出力來建立一個持久和公正的國際制度。」他的這段話似是對一日晚鄧小平的「天下大亂，形勢大好」那段反對美國對俄「緩和」政策而發的。

從上述雙方的這些話看來，加以會談結束時並無發表公報，無怪若干新聞記者都認為福特此行「一事無成」。就是有點成就，就像洛杉磯記者所報

導的：「福特總統與鄧小平共有八小時的會談，其產生的唯一具體宣佈，是中共將送回越戰中喪生的兩名空軍人員的遺體」。究竟有無其他具體的結果？以慣玩秘密外交起家的季辛吉，使得老練的記者們摸不到事實的真相。

從四日季辛吉在北平記者會的談話，可知此次北平會談的主要問題有：毛共反對美俄和解問題，韓國問題，所謂台灣問題，歐洲問題和安哥拉問題等。

毛共感覺到受蘇俄的威脅，越來越加緊迫，此次表明無條件歡迎福特特訪，旨在運用謀略，拉美制俄，而從反對美國與俄「和解」入手。據二日合衆國際社北平電訊：「此次福、毛會談時間之長，暗示中共雖然反對美俄『和解』，仍要與美國保持堅固的友好關係。」次日，白宮新聞官奈遜（Don Nessen）對記者會說：「福特總統會與毛澤東談及美俄和解問題，結果達成一種更好的了解。」季辛吉在四日的記者會中說：「對美俄和解問題，中共沒有向美國提出任何要求」，又說：「對此問題的辯論，並不構成廣泛討論的中心。」①

福特在告別宴時也說：「雙方將依本身利益的觀點，去採取自己認為最合適的政策。」這句話似是他對奈遜和季辛吉的說法作一結語。

關於韓國問題，季辛吉在四日的記者會中說：「韓國問題已討論過，雙方意見並不一致，但彼此了解對方的立場。我們希望雙方對朝鮮半島事件，將加以約束。」②

韓國外交部長金東祚於十二月九日與美國主管亞太地區助理國務卿哈比（Philip Habib）會談後告記者們說：「福特與毛澤東會談，雙方對韓國問題沒有結論。」

李嘉先生近在中國時報發表「從東京看福特的北平之行」一文，其中提到「一位美國（駐日）大使館的高級官員說：關於韓國問題，雙方所獲致的諒解是非常有限的。」又提到「一位日本外務省的高官則說：都要求美方就北韓所提的和約草案，直接與金日成談判，美國當然即席拒絕。因此在韓國問題上，雙方毫無政治上的成就」。

③證諸上述金東祚的話，後說較為接近事實。

關於歐洲問題，季辛吉對記者會說：「會談中對歐洲問題也討論很多。但他沒有透露討論的內容。記者問到『多少時間討論安哥拉問題？』季氏

只答以「已討論過」，「分析了情況。」

綜上所述，顯見美、毛北平會談，對所謂美俄「和解」問題，韓國問題，歐洲問題和安哥拉問題，除非另有秘密協議，都無具體結果。

對所謂台灣問題，他們所談費時較多。福特在一日晚宴會致詞中說：「關係正常化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保證致力於那些最初步驟所確定的目的和原則，謀求雙方分歧的諒解，繼續努力於上海公報基礎上建立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他在四日晚的告別宴時又說：「在會談中，我曾重申美國有意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完成正常化的願望。」

在福特這兩次講話的中間一天——十二月三日，華盛頓郵報的隨行記者發自北平的電訊說：「中共一再壓低台灣問題」；「福特此行的主要關鍵，在於能否使中共相信美國仍然是個可靠的合作伙伴。」他的這種報導，繼以次日合衆國際社隨行記者關於「日本模式」的錯誤報導，曾引起人們的種種猜測。

「日本模式」誤解之澄清

十二月五日美國合衆國際社北平電訊：「季辛吉在北平的記者會說，美國希望依據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承認中共的模式，謀求一項解決方案。」同日，美聯社的北平電訊：「季辛吉說，他覺得中共已明白表示，他們願意接受和日本相同模式的行動。」從這兩種報導的措詞看來，對採用「日本模式」之議，前者表明主動的是美國，後者則誰是主動者，詞意含糊。這兩種新聞報導，當時曾引起一般讀者的關切。次日各報發表中央社根據季辛吉談話的錄音，從華盛頓發來的電訊，才證明所謂採用「日本模式」是發自毛共的要求。後來證之於美國新聞處印發的當時季辛吉談話的謄本，顯示中央社的報導完全正確。

季辛吉的這段話是答當時記者的發問。記者問：「閣下是正在以密碼方式談台灣問題。究竟正常化是什麼意思？在這個問題未正常化前，中共要我們做些甚麼？甚麼是必需的？」季氏答：「我認為中共已經表明他們要求的一般模式，是類似日本的模式。我認為我們也已表明，這一過程的成熟，以及某些情況的存在，都是需要時間的。」④由此顯見所謂「日本模式」之議的

主動者是毛共，而不是美國。此與中央社五日的報導相符。

美國助理國務卿哈比此次來華訪問時，曾向我政府當局澄清所謂「日本模式」之說。十二月十七日，他在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特別調查小組作證時報告：採取「日本模式」，以達成「關係正常化」，乃是中共的要求，但是美國認為這必須要有某種環境存在。因為美國比日本更深的介入中國事務——美國對華有條約的義務。⑤

會談結束不發公報

美、毛會談後爲什麼不發表公報？隨行記者曾以此問季辛吉。季氏答以兩點：一、他所說明的都已在其他公開場合說過了；二、各種基本原則，尤其是關於台灣的，已見於「上海公報」，無須再加。所以不須費時去準備公報。

關於所謂「台灣問題」，美毛雙方的距離還遠，目前福特對內對外的處境與一九七二年尼克森時大相懸殊。他除了重申「上海公報」，還有什麼可說？對於毛俄間的矛盾，美國只圖利用，自不會墜入毛共的反「和解」圈套。至於朝鮮半島問題，毛俄在聯合國中一致反美。毛澤東雖以不捲入韓戰的話爲餌，福特除堅定不與北韓直接談判外，實在不須有何公告。美毛間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沒有公報發表，這是無可驚異的。至於雙方間如有關於貿易交流或解決資產懸案的協議，那是不够作公報內容的。

沒有公報，是否有秘密協議或默契？因爲雙方的政權都在不穩定的狀況下，美方會感覺到毛、周在世之日無多，奪權鬥爭的危機潛伏，隨時可能爆發。毛共也明瞭福特競選總統，阻力頗大，將來能否當選，尙成問題。由於雙方間相互疑慮，此次會談可能不會達成秘密協議，但不能排除有某些默契的存在。

福特與鄧小平在最後一次的會談中，福特說：今後幾個月，我們會很富有意義地增進雙方的共同利益。鄧隨著說：「我同意這句話。」這對話究何所指？這不是雙方已達成的默契嗎？

福特訪菲，當他抵達馬尼拉機場時，駐菲各國使節都到機場歡迎，只有毛共駐菲僑代辦蕭特沒到。據記者猜測，這可能是毛共對季辛吉洩漏「日本

福特訪北平與「新太平洋主義」之宣告

模式」密談而作的一種報復⑥這雖屬揣度之詞，但也值得注意。

對「新太平洋主義」之評估

福特於十二月五日離北平飛抵印尼訪問。翌日飛抵菲律賓訪問。在這兩國都受到很熱烈的歡迎和坦誠的會商，與他在北平時所受的尖刻待遇，適成相反的對比。七日，福特於回程中停留於檀香山，在夏威夷大學發表演說，宣告他的「新太平洋主義」(A New Pacific Doctrine)，提出六項基本原則：⑦

一、美國不孤立。這個地區的安定，有賴於美國在亞洲力量的維持。「對我們的亞洲友邦和盟國保持其主權和獨立，仍然是美國政策的最高目標。」
二、與日本爲夥伴，這是美國戰略的「支柱」。「我所致力從事的無過於美、日關係。美國努力於遠方文化和人民的聯繫，其歷來成就的事實，也莫過於美、日關係。」

三、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在成爲國際政治景象的一種長久特徵，不但對兩國人民，而且對這個地區，乃至全世界都有利益。」
四、繼續與東南亞的利害關係。美國對印尼、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担政治與經濟的關切。對西南太平洋的澳洲和紐西蘭亦是如此。「我在訪問我們的友邦時，知道它們要美國對這個地區的事務保持積極的關係。我們決定如此的做。」

五、解決韓國和西南半島的政治衝突。美國支持南韓，但是準備考慮「採取建設性的途徑」，去和緩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對西南半島的那些共黨，「如果它們對各鄰邦的關係，表現自制，對國際問題，採取建設性的途徑，我們則決定只看將來不究既往。」

六、與亞洲造成一種「經濟合作結構」。當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的合作發展，我們的經濟是相互增長的。

自今年四月越南和高棉相繼淪陷之後，菲律賓和泰國分別要求與美國談判結束美軍事基地和撤退美軍；繼而該兩國接踵承認毛共；迄至最近寮國赤化，毛俄對中南半島各個共黨政權的爭奪加劇。在此期間，世人渴望美國的亞洲新政策早日揭曉。直至福特訪毛之後，才見其「新太平洋主義」的宣告。研析其提出該主義六項基本原則的講詞，發覺它似是急就章的文件，不僅有

如國際前鋒論壇批評其只是概論，不够具體。⑧，也不僅有如華盛頓郵報指出它沒有新的主張，也不能解決舊的難題。其實它還有若干自相矛盾或曖昧不明的缺點。

該主義既表明美國政策的最高目標依然是維護亞洲友邦和盟國的主權與獨立，中華民國是美國的盟國，但美國還肯定遲早要與毛共關係正常化，並以此列為該主義的一項基本原則。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基本原則中也揭出：美國繼續保持與東南亞的利益關係，並關切東南亞國協五國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可是當前泰國北部武裝泰共的顛覆活動和寮共的入侵，都是由於毛共與北越的組訓和支援。菲律賓境內非共的武裝叛亂，是由毛共供應軍火並受其指揮。馬共在馬來西亞的叛亂也是受毛共的各種支助。福特對此危害東南亞國家的元兇，竟圖與之關係正常化，這顯然亦是自相矛盾。

關於朝鮮半島問題，毛共與蘇俄一致的支持北韓，無論在聯合國內外都是如此。這就是該地區「緊張情勢仍然存在」的主因。這種事實也證明了季辛吉拉毛制俄的策略顯已破綻。「新太平洋主義」對此問題，所謂考慮「採取建設性的途徑，去緩和局勢的緊張」，顯然是徒托空言。

歲首展望世界經濟

艱苦的一年

一九七五年世界經濟的一般特性是貿易量減少，生產的成長率下降，失業率增高和各國貿易逆差發生困擾。過去十個月間，衰退的膨脹普遍襲擊每一個工業國，而受打擊最重的，是沒有石油的開發中國家。因為石油輸出國提高油價，開發中國家不得不為輸入石油而增加支出；由於世界性的膨脹，而不能輸入高價的工業製品；又由於其輸出主要市場的衰退，而使其所輸出

「新太平洋主義」中也提到美國對中南半島各共黨政權的政策，將視他們對美國的行爲如何而決定，這種無視於毛、俄在該地區爭奪的實況，而作消極退縮的觀望，此與福特宣佈該主義的第一基本原則是抵觸的。因為該項原則表明美國政策的最高目標，仍然是「保持我們的亞洲友邦和盟國的主權與獨立」。赤化前的越南、高棉和寮國都是美國的友邦，新太平洋主義顯示了對中南半島淪陷的默認。

福特不顧美國內外的勸告，而在訪毛共。他在回程的飛機裏對記者們說：「此行各事都極美好，沒有任何負數，而有許多正數。」他也只好如此表達，才能符合其爲競選而東行的初衷。

註① *Kissinger's Dec. 4, News Conference, U.S.I.S., Taipei, Dec. 8, 1975, p.4 p.5* ② *Ibid., p.8* ③ 中國時報六四年十一月十九日。④ *Kissinger, op. cit., p. 7* ⑤ *By George Gedda, Washington, AP, Dec. 18, 1975* ⑥ 中央社馬尼拉六四年十二月六日電訊。⑦ *Ford's Six-Point Pacific Doctrine,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2, 1975, p. 26* ⑧ *Ford's Pacific Doctrine, Editorial, Herald Tribune, Dec. 9, 1975*

六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完稿

陳 元

的原料、初級產品和食物的價格不振，諸如鉛、鋅、錫、銅、橡膠、羊毛、棉花、糖和其它基本商品。在工業國沒有充分復蘇以前，這些無油的開發中國家無法脫離困境。

即使富有石油的開發中國家，其好景也趨向下坡。一九七四年石油輸出國的繁榮達到高峯，一九七五年由於世界性衰退，使石油的需要減少，這些國家的工業化計劃自必也遭遇阻礙。

蘇聯集團指當前的世界性經濟問題是『資本主義的危機』。然而，在一